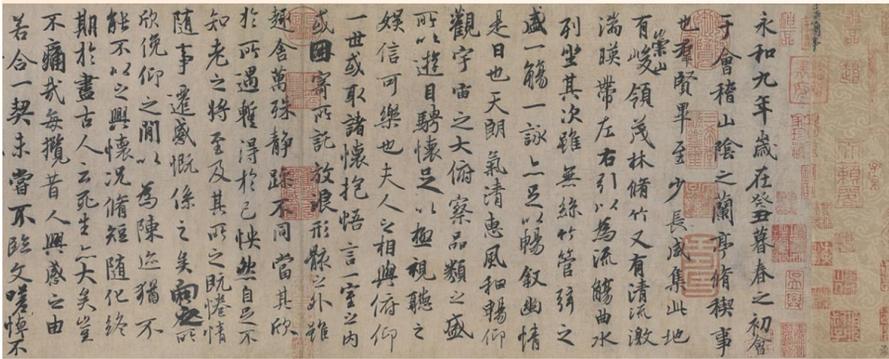


翰墨风流冠古今

——读《兰亭序》

□李昕



唐代冯承素摹《兰亭序》(局部)。

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美誉的《兰亭序》，问世近1700年，是世人心摹手追的书法佳作，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。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，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，不只是技法，更是文化依归。

《兰亭序》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，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。赓续文脉传统，陶铸时代精神，走好创变之路，这或许是《兰亭序》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。

文史大家周汝昌曾说，中华文化有三大国宝——《兰亭序》《文心雕龙》《红楼梦》，皆属极品，后人难以企及。在他看来，这三者存在“多谜性”——异说多、争议多、难解多，历代史家着力注疏考证，唯此三者称最。其中的《兰亭序》，罕书珍墨，绝代佳作，单是太宗心仪右军、萧翼计赚兰亭以及兰亭下落、真伪、论辩等趣闻轶事就吊足世人胃口，成为经久不息的文化谈资。

相传《兰亭序》为王羲之酒酣耳热之际，乘兴挥毫而成。作品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，以鼠须笔写在蚕茧纸上，遒媚飘逸、圆转流美、劲健婀娜。据说次日，王羲之酒醒，展卷捧读钟爱无比，便试着伏案重写，结果均未与原来神韵，不禁感慨，“此神助耳，何吾能力致。”

在书法史上，《兰亭序》是神来之作，是谜一般的存在……

公元353年(东晋穆帝永和九年)的上巳节，与往年并无二致。北方战事依然胶着。大地复苏，春光日暖，人们来到水边沐浴洗濯，祈福祛邪，是为修禊。文人雅士借机邀约相聚，赏景听琴，品茗饮酒，吟诗作赋，是为雅集。

会稽山阴的兰亭，四周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清流急湍……天地澄澈，一如王羲之的心境澄明。风和日丽，风物闲美。大家列坐溪水两侧，觴置于溪中，顺流而下。依约定，觴停于面前，就得赋诗，否则罚酒三杯。于是，一时饮酒吟诗好不畅快，一唱一和尽显文士风流。

参加雅集凡四十二人，王、谢、郗、庾等世家大族悉数到场：王羲之、王徽之、王献之、王凝之、王玄之、王蕴之、王丰之、王肃之、王彬之、王涣之、徐丰之、曹茂之、曹礼、曹华、孙绰、孙统、孙嗣、谢安、谢万、谢琨、谢朓、谢铨、郗昙、庾友、庾徽、魏滂、桓伟、羊模、孔恢、后缙、刘密、虞谷、虞说、任凝、袁峴之、华茂、劳夷、华普、卞迪、丘髦、吕系。

王羲之，时年五十。两年到任会稽，主持郡内事务。谢安、谢万，兄弟二人才器出众。谢安33岁，此时距“淝水之战”尚有三十年，但已声名天下。孙绰，39岁，少因文闻名。当世名人去世，必延请撰文，刊石刻碑。曾作《游天台山赋》，文辞颇得好评，他对友人说：“脚试掷地，当作金石声也。”掷地有声即出典于此。

郗昙，33岁，散骑侍郎，太尉郗鉴之子，王羲之妻弟，善草书，“密壮奇姿，玩迹重照，若投石拔距，怒目扬眉”。庾友、庾徽，司空庾冰之子，颇有声名。据考，雅集十一人成四言五言诗各一首，十五人各成诗一首，十六人诗不成，罚酒三觥。诗作辑为一册，王羲之担纲作序，是为《兰亭序》。

永和九年，岁在癸丑，暮春之初，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，修禊事也。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。此地有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；又有清流激湍，映带左右，引以为流觞曲水，列坐其次。虽无丝竹管弦之盛，一觴一咏，亦足以畅叙幽情。是日也，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。

夫人之相与，俯仰一世，或取诸怀抱，悟言一室之内；或因寄所托，放浪形骸之外。虽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，当其欣于所遇，暂得于己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向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以为陈迹，犹不能不以之兴怀。况脩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。”岂不痛哉！

孙过庭以“体五材之并用，仪形不极；象八音之迭起，感会五方”形容书法之妙，如果前者即言点画结体章法，后者可谓笔墨韵律节奏，二者相

得益彰相映成趣。细观“兰亭”，点画笔法，灵动流畅，挺逸隽美；结体安排，疏密有致，得体匀美；章法意蕴，行云流水，生动盎然。

《兰亭序》美在笔墨技法。黄庭坚说：“反复观之，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。”赵孟頫感慨：“书法以用笔为上，而结字亦须用工。盖结字因时相传，用笔千古不易。右军字势古法一变，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，故古今以为师法。”董其昌评价：“其字皆映带而生，或小或大，随手所如，皆入法度，所以为神品也。”诚如王羲之所说：“视形象体，变貌犹同，逐势瞻瞻，高低有别。分均点画，远近相须；播布研精，调和笔墨。锋纤往来，疏密相附，铁点银钩，方圆周整。”单论全篇20个“之”字，极尽变化，与上下左右呼应有致，顾盼生姿，无丝毫违和。

《兰亭序》美在文字文本。扬雄有“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”之说。书法是汉字书写艺术。如果说汉字是书法的形成基因，文本则是内在灵魂。作为文化独特标识，书法经典必定历经时间打磨、沉淀时代精华。《兰亭序》是世人心摹手追的书法佳作，也是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。吴楚材、吴调侯选注《古文观止》评道：“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。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，鲜实效。一死生而齐彭殇，无经济大略，故触景兴怀，俯仰若有余病。但逸少旷达人，故虽苍凉感叹之中，自有无穷逸趣。”

两年前，王羲之挈妇将雏来到越中，安家戴山之下。会稽是摄政王司马昱的封地。二十三年前，会稽王司马昱尚年幼，王羲之被选为会稽王友。六年后，调入征西将军庾亮府任参军……看惯狼烟烽火旌旗猎猎，看淡刀光剑影鼓角争鸣，看倦权臣争斗尔虞我诈，他抽身军旅沙场，远离建康权力漩涡，得机赴任会稽。上任次年，逢旱灾，粮食歉收，百姓饥馑无着。商绅囤积居奇，朝廷以储备军粮为由驳回王羲之赈灾请求。情势危急，他心急如焚，下令断



明代文徵明《兰亭修禊图》。

酒节粮，居然有人反对。他向友人坦陈：“百姓之命倒悬，吾夙夜忧，此时既不能开仓赈粟，因断酒以救民命，此有何不可……吾复何在，便可放之，其罚之制，宜重可，可治日，每知卿同在民之主。”他恢复建设漕运，减轻刑罚以解决用工难，严惩贪官污吏的“鼠耗”行为。得知吴会百姓赋役尤重，他上疏据理力争，减轻赋税徭役等策多为朝廷采纳。

虽劳心费力，但民有所得，令其颇感欣慰。年前北伐战况不利，在王羲之意料之中——主帅殷浩是好友，但不帅才，王羲之数次上书反对无果，民抗国耻，徒增感伤。意料之外的是次年兵败，殷浩被贬庶人，郁郁寡欢，不久便亡故。一念过往，一念将来。乱世之上的上巳时节，万物发春华，案牍劳形之余，广袤天宇之下，畅叙幽情，自然生发关乎生命的感慨……

死生亦大矣。这是《庄子·德充符》中记述孔子的感慨，由此他赞誉鲁国兀者王骀内心之德，“审乎无假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”。追问生死，是探寻生命终极价值的哲学基本命题。对待生死，隐忍抑或暴怒，回避抑或直面，随性抑或持重，因人而异。几位特殊人物的离去，让王羲之刻骨铭心。

父亲王旷，朝廷肱股之臣。经过八王之乱，西晋岌岌可危，他力主南渡建康，孤军在北伐前线征战。公元310年，在当年白起围歼赵括军队的长平，与北方之敌激烈交战，全军覆没，王旷就此生死不明。《晋书》说王羲之“幼讷于言”。仓皇南渡，经历簪缨之族的家道中落，父亲是如影随形却难以言说的痛楚。对王旷，能匡功业，一念之下，生死凶险难料；对王羲之，幼年失怙，一朝之间，人间冷暖尽知。

叔父王敦，东晋立国重臣。王敦颇赏识王羲之，曾当面赞誉，“汝是我佳子弟，当不减阮王

薄”，寄予光耀王氏家族厚望。王敦行事强势，功高震主而致“王敦之乱”，终死于军营。王敦从功臣到罪人的逆转，确是不小的震动。父亲不明就里消失的阴影未散，叔父谋逆病故如同大山，压在家族门楣上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
23岁时，王羲之出仕。经历司马昱王府任职，再转庾亮将军府幕僚。庾亮顶着压力准备北伐，不幸遇挫，怏怏而卒，临终前向朝廷举荐王羲之“清贵有鉴裁”。庾翼接任，依然器重王羲之，依然积极北伐。

永和元年，庾翼病死北伐军中。一位位器重他的重臣良将先后离世，生死意象竟如此惨淡。

桓温势力崛起，起用殷浩成为朝廷首选。永和三年，王羲之接受殷浩推荐，担任护军将军。司马昱、殷浩积极准备北伐。国难之时，殷浩、桓温不睦，王羲之毅然出面，“密说浩，令与桓温和同，不宜内构嫌隙，浩不从”。眼见北伐行将重蹈覆辙，他改变了素来支持北伐的态度，再三上书劝阻。一意北伐，难逃国家蒙乱，百姓遭劫。支持北伐，只有失败；反对北伐，只有失望。当殷浩和司马昱主意已定，王羲之唯有抽身而退，失望而归。

离开军营，暂居建康。殷浩敬仰王羲之为人，“逸少清贵人，吾于之甚矣，一时无所后”，修书力劝他出来任职。“悠悠者以足下出处足观政之隆替。岂可以一世之存亡，必从足下从容之适？”天下之治，由得贤也；天下不治，由失贤也。怎能以国家存亡大义服从个人散淡闲逸的生活志趣呢？

这次，听从殷浩建议，王羲之上任右军将军、会稽内史。这就有了后来的《兰亭序》。

魏晋风度，是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文化现象。

国家战事频仍，社会动荡不安，饱受物质和精神之苦，却形成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魏晋风度。“立异于众贤之外，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。”张怀瓘张达达的求真、回归清丽质朴的尚简、追求俊逸奔放的崇美，风行文人圈。由此，“晋人以虚灵之胸襟、玄学的意味体会自然，乃能表里澄澈，一片空明，建立最高的晶莹的美的意境。”反映到书法领域，文人自我内省和率性表达，“把笔抵锋，肇乎本性”，风流自赏，我手写我心，率真简淡、妍美流畅成就尚韵书风。

宋代蔡襄激赏晋书风韵，“书法惟风韵难及。虞书多粗犷，晋人书，虽非名家，亦自奕奕有一种风流蕴藉之气……可以精神解领，不可以言语求觅也。”行草书更见其精髓。宗白华曾评析晋书美学意蕴：“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，无法而有法，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，一点一拂皆有情趣，从头至尾，一气呵成，如天马行空，游行自

在。又如庖丁之中肯綮，神行于虚。这种超妙的艺术，只有晋人萧散超脱的心灵，才能心手相应，登峰造极。”

从东汉到魏晋，亦是隶变时期，楷行草等书体正逐步定型，书法审美新风尚正待形成。书法艺术性相较实用性愈渐凸显，质朴稳厚的篆隶书风流变为遒劲晓畅的行草书。王羲之博采众长，行书创变自成一格——精妙流美的字体体现楷法的完备，飘逸俊雅的笔法融合楷书的健朗。《兰亭序》个性洒脱、意趣盎然、意韵深厚的书风即为典型，因应了社会审美需求。

梁武帝萧衍以“龙跳天门，虎卧凤阙”形容王羲之书法。龙卧是力度与厚实，是端庄稳健的风貌；龙跳是雅致与散逸，是畅快流动的气息。动静相应，方圆并用，是为中和之美。《兰亭序》内擫取势，聚力凝神；外展妍美，清新俊雅。“不激不厉，而风规自远”，尽显中和神韵。物象之美、意象之妙、情象之趣，王羲之“我书我心”走出书法发展的另一境途。

明代项穆曾说：“圆而且方，方而复圆，正能含奇，奇不失正，会于中和，斯为美善。”中和，乃书法之道。熊秉真先生将中和视为书法最高理想，中和“穷变化、集大成”。古今一揆。张怀瓘有评价，“右军开凿通津，神模天巧，故能增损古法，裁成今体。进退宪章，耀文含质。推方履度，动必中庸。”中和书风的形成和追捧，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价值理念和艺术情趣。故自梁唐后，王羲之书法成为“终古之独绝，百代之楷模”。

文化是心灵的学问，艺术是心灵的创造，书法即为心灵之道。宗白华说，中国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，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，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。齐白石认为，中国艺术最基本的源泉是书法，对于书法若没有相当的认识和理解，那么和中国的一切艺术可以说绝了姻

缘。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气质的典型象征，书法表达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律动，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命态度。

书法以笔墨呈现真实性情，体现书者对自然世界与内心世界、对宇宙生命与自我生命的映照。通人之变是书家追求的至高境界，有诸于中而形诸外，得于心而应于手。王羲之就有“书者，玄妙之伎也，若非通人志士，学无及之”之论。于哲学意蕴中，书法透露出书者的人文趣味、行为方式与价值取向。

衣冠南渡，风雨飘摇，群雄割据，生灵涂炭。时人崇尚老庄，大谈玄理，寄情山水，沉迷炼丹饮酒，直感慨生若浮萍。然而死生亦大矣，俗世之中，还有世俗之上。人生苦短，惜时悲老，还需眷念生活，经世致用，有所作为。

王羲之受时风影响但不为羁绊。某日，政务之余，与谢安登楼远眺。谢安一番论理，便生弃世归隐之念。王羲之曰：“夏禹勤王，手足胼胝；文王旰食，日不暇给。今四郊多垒，宜人自效。而虚谈费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国家动荡危难，怎能安于闲谈论道？回看这段话，堪为他会稽内史上勤勉尽心的写照——身处乱世，生而有涯，亦当行有为之事。

人之在世，趣舍万殊，静躁不同。所遇之事满意，便会沉浸其中欣然自得而不知时光流逝。及其所之既倦，情随事迁，感慨系之矣。于是，悟言一室者有之，放浪形骸者有之。面对同僚幽暗掣肘，骨鲠爽直不流俗的他再次抽身而退。不是退避，而是“志于道，游于艺”。公元355年，王羲之告病辞官。久在樊笼，复返自然。“修植桑果，今盛草茂。率诸子，抱弱孙，游观其间。有一味之甘，割而分之，以娱目前。”

睥睨天地，人生过客，孰为重？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。在时间面前，所有清谈虚名、权位利益都将变为陈迹，个中生死之道，任何豪杰英雄版夫走卒概莫能外。北伐途中，桓温见到往日手植柳树已有十围之粗，心生感慨：“木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！”攀枝执条，泫然泪洒。此番，王羲之悠游林下，“坐而获逸，遂其宿心”。

世事漫随流水，算来一梦浮生。超脱世事，并非超然物外。他忧心献之婚事，致信友人：“吾有七儿一女……唯一小者尚未婚耳。过此一婚，便得至彼。”他念念不忘川蜀山水，致信周抚，“想足下镇彼土，未有动理耳。要欲及卿在彼，登汶岭，峨眉而旋，实不朽之盛事。但言此，心以驰于彼矣。”

北方战事令人忧心。公元356年，琅琊临沂祖墓遭毁，不能前往修整，“痛我肝心，痛当奈何？”同耻家恨，王羲之悲愤至极，写下《丧乱帖》。公元358年，意欲北伐的桓温委以谢万重任。殷鉴在前，深为忧虑，他告诫谢万，“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，则尽善矣。食不重味，居不重席……济否所由，实在积小以致高大，君其存之。”不骄奢傲物，勿以善小不为，心性通达，循事理而行。

生死无常，斗酒相娱，乱世江湖醉一场；死生无畏，归来去兮，金戈铁马梦一场。叩问生死，王羲之放下的是俗念纠缠，放不下的是国事亲情。临池濡墨染翰，他于现实与精神间寻一隅安放内心的乐土。

书法乃指间之技，纸上之艺，更是腹内之文、心中之道。苏轼评价王羲之书法“萧散简远，妙在笔画之外”。刘熙载说：“学书者有二观：曰观物，曰观我。观物以类情，观我以通德。”读懂王羲之书法，不只是技与艺，更是安身立命的道与义——闪耀人性光辉，有道家通透放逸，也有儒家厚重健朗。如此，《兰亭序》就是参透人生、探明事理、关乎生死哲学的精彩导引，映照出中国文士澄明通透的心灵天空。

公元1310年，57岁的赵孟頫奉诏前往大都，过南浔，好友独孤淳朋前来送别，并让与《宋拓定武兰亭序》。这令其喜不自胜。“北行三十二日，秋冬之间而多南风，船窗晴暖，时对兰亭，信可乐也。”舟行途中，潜心赏玩临习，并专为之作跋，仅独孤本就有十三跋，后称《兰亭帖十三跋》。“学书在玩味古人法帖，悉知其用笔之意，乃为有益。右军书兰亭是已退笔，因其势而用之，无不知止，兹其所以神也。”赵孟頫感慨不已，“右军人品甚高，故书入神品。”作为二王书风承前启后人物，他道出《兰亭序》艺文兼备、技道互参、人书合一的魅力了。

有人说，王羲之书法流传至今，蕴含强大生命力与艺术美，不只是技法，更是文化依归。失去母体文化的艺术创作是没有出路的。唯有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，方能使书法焕发新生。正因如此，历代摹刻不断。《善本碑帖录》记载：“自王羲之《兰亭序》问世以来，临摹本中上佳者有《定武本》《神龙本》《褚摹本》《薛稷本》《落水本》《东阳本》《上党本》等18种。”《兰亭序》原本下落已成历史悬念，但众多摹本拓本艺术价值光彩熠熠。米友仁曾赋诗：“翰墨风流冠古今，鹅池谁不赏兰阴。此书虽向昭陵朽，刻石犹能易黄金。”

后之视今，亦由今之视昔。《兰亭序》以无声语言承继中华文化传统，成为华夏民族不朽的精神载体。清代沈宗骥《芥舟学画编》有“自出精意，自辟性灵，以古人之规矩，开自己之生面”。赓续文脉传统，陶铸时代精神，走好创变之路，这或许是兰亭留给今人的重要启示。

今天的绍兴，在兰亭故地辟有右军祠，配建流觞亭、曲水流觞等小品，定格那场雅集盛况。流觞亭廊柱有对联：“此地似曾游，想当年列坐流觞未尝无我；仙缘难逆料，问异日重来修禊能否逢君。”

天地悠悠，日月光华。感谢王羲之和《兰亭序》，因为这中国文化的丰碑巨砾，我们连接前人，照耀未来！

众所周知，王羲之的湖笔情结

程根子

中国的毛笔，起源甚早，而湖笔闻名于世，是在八百年以前的元朝。湖笔的产生，笔妙无伦，取代了直笔。在当时，人们愿以千金重价求买湖笔，足见其声誉卓著的程度。王羲之历来对选用毛笔很有研究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直爱用宣笔，宣笔制造已有二千年历史，始以免毫竹管为笔。湖笔起于宋元时期，兴盛于元，明清超越直笔而后来居上。

还是在王羲之刚到湖州为官的第二天晚上，谢安手里握着一支毛笔，喜不自胜，兴冲冲赶到王羲之的居室，见了王羲之，心潮澎湃地说：“大师，原来这湖笔笔锋挺立，富有弹性，浑圆饱满，运用自如，我送你一支，你先试试。”王羲之接过笔，仔细细观审毛质，发现湖笔造料严格，精选山羊腋下之毛，经过陈宿多晒，除去污垢，浸于水中进行分类组合，用西天目山北麓灵峰山下的鸡毛竹制作笔杆。鸡毛竹节稀杆直，竹内空隙细小，轻重适中，手握沉稳。

于是，便展开宣纸，笔酣墨饱，笔走龙蛇，行云流水，落笔如云烟，神妙无比，连写数幅，仍欲罢不能。当王羲之的书法生涯进入鼎盛时期，他选用毛笔更为挑剔，平时爱用鼠须笔或狼毫笔写字。相传王羲之是用鼠须笔、蚕茧纸书写成《兰亭序》的，其实不然。

据考证，因王羲之偶得谢安赠那支称心如意的湖笔，他如获至宝，大喜过望，非常感激谢安，第二天设宴招待谢安和朋友们。宴会结束，王羲之尽管酒醉欲倒，然书兴大发，就用这支湖笔运笔挥洒，含墨饱满，枯润适用得当，则墨色笔意变化无穷，一连写下十多篇稀世珍品，使在场朋友大开眼界，无不惊叹折服，纷纷索要收藏，并奉为至宝。

从此王羲之与湖笔正式结缘，他认为湖笔以羊毫取胜，锋长、柔软、含墨量大，得心应手。他曾经还赋予其各种别致的代称，意趣盎然，耐人寻味。

恰逢江南草长、群莺乱飞的季节，王羲之邀请谢安、谢万、孙绰等文人墨客在绍兴兰亭踏青游春，饮酒赋诗。他们围坐在曲水之畔，尽情欣赏兰溪岸边无限美景，心情莫不怡然快活。时近日暮，雅士们仍然意兴不减，每人吟诗一首，沉浸于诗酒的浪漫回味之中，不忍归去。众人共推王羲之撰序并书，王羲之并不推辞，微醉乘兴，即席挥毫，此时他情来神爽，已进入天人合一的状态，发挥得淋漓尽致，真正将书、酒、字三者融为一体，挥洒自如，一气呵成，写下了千古不朽的天下第一行书《兰亭序》。一幅《兰亭序》，奠定了王羲之在书法界里的千古地位，至今无人撼动。

湖州历来是东南形胜之地，历代才子迭出，文风不绝。王羲之和很多雅士都曾为官或寓居湖州。他对湖笔一见钟情，爱不释手，直到终生。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居湖之永欣寺三十余年，用败的笔头积满五簏，葬之“退笔冢”。可想而知，他们的书画活动，必定带动湖州的制笔业兴旺发达。

湖笔，与徽墨、宣纸、端砚并称“文房四宝”，是中华文脉悠长灿烂的重要象征。湖笔有“毛颖之技甲天下”的美誉，也被誉为“笔中之冠”。2006年，湖笔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王右军



王羲之像。